

郑观应“商战”思想新论

●程连升

郑观应(1842—1922年),广东香山。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在其完整的改良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当推“商战”主张。笔者认为,“商战”思想是一个旨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纲领,其中心含意是通过增强中国近代实业及其市场竞争力来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用富强救国代替单纯的兵船救国,而绝非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易立国论。

要真正准确地理解“商战”论的含意与性质,就须弄清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以及郑观应对其内容的系统阐述。

一、“商战”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在19世纪70—90年代形成的。综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下述两方面的特点:

1. 列强经济侵华势力日盛,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迅速加剧

1858年,科举之途“小试不售”的郑观应,前往上海谋生,从而开始了充任买办与经营工商业的生涯。当时,正值列强继第二次鸦片战争军事胜利之后,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侵略中国,并日益造成中国边疆危机的时期。特别是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夺走了许多中国人的生计与巨额财富,导致中国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这种经济侵略的格局,可从下表^①中看出。

19世纪60—90年代中期中国外贸情形表

单位:千海关两

年份	洋货进口净值	国货出口总值	出超(+)与入超(-)	进出口贸易值的指数
1864	46,210	48,654	+2,444	100
1866	67,174	50,596	-16,578	124
1870	63,693	55,295	-8,398	126
1874	64,361	66,713	+2,352	139
1878	70,804	67,172	-3,672	146
1882	77,715	67,337	-10,378	153
1886	87,479	77,207	-10,273	174
1890	127,093	87,144	-39,949	226
1894	162,102	128,105	-33,998	306

面对中国利权外溢和外国商人“喧宾夺主”之势,郑观应始则本能地愤慨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运销鸦片、歧视华人等可耻行径,并直观地提出禁贩“猪仔”、杜绝烟害、赈济游民乞丐等救助贫民与整合社会的建议,流露出关切民虞和社会问题的进步倾向。继之,他通过亲身经营商务的实际经历,“内之积感于寸心,外之睠怀于大局”,^②在70年代后积极寻求对付资本主义侵略的策略,从而逐渐形成了促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拯救民族危亡的“商战”论思想。该思想发诸70年代辑录的《易言》中,成熟于八、九十年代写成的《盛世危言》一书。

2. 洋务企业活动弊端的日渐显露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减轻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一部分封建统治者开始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旨在求强自救的洋务运动。70年代初,鉴于前期制造“坚船利炮”的困难与局限,洋务运动遂从“求强”转向“求富”。这一转变在洋务派头目李鸿章的认识中表现得最为明朗。他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⑧洋务派在“寓强于富”的认识指导下,着手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工矿交通企业。洋务运动重心的这种调整,对于早已在外商企业中附股、并强烈感受到列强经济侵华行动日益加紧的郑观应来说,不能不产生优先发展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共识,他讲:“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⑨正是在急切盼望民族经济强大的心情下,郑观应于70年代末毅然放弃了买办职务,转而投身于洋务企业的创办与经营。

然而,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着眼点在于解决军事工业在经费、原材料、燃料和运输等方面的不足,其目的仍在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及其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如此,则民用工业活动,就不能超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范围。清政府给每个民用企业都挂上一外“官”字,如“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其中“官督商办”形式占了绝大多数。这样,民用企业组织中的封建作风与资本自身发展的矛盾必然存在:管理的垄断、人事的委派、经营混乱贪污,再加上各级封建政府的强征乱摊,商民利益倍受侵蚀。愈到后来,洋务派把持民用企业的弊端日深,商民入股兴趣也就愈加下降,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为了摆脱封建势力对近代经济的束缚,进入80年代后,一般商民们均主张企业的举办“当去官督之名求商办之实。”^⑩郑观应触目所见,也不由感愤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他指出:“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⑪因此,他向清政府明确提出了“不由官办,专由商办”,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自由投资,加快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强烈愿望。

由上可见,郑观应“商战”思想的形成,反映了19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加紧经济侵华行动,导致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加剧,这是“商战”论形成的外因;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清政府创办实业活动过程中的严重弊端,激起民族资产阶级的日益不满,这是“商战”论形成的内部条件。

二、“商战”论的主要内容

以往论者,大多认为郑观应是“重商主义者”,这是由于对其经济思想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所致。有鉴于此,细致阐明郑观应“商战”论的内容体系,就成为纠正上述片面认识的关键。笔者综其所述,概括“商战”思想的内容为以下三端:

1. 寓强于富 重视“财战”

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这是中国近代思想上一个显著的特点。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从军事侵略开始的,中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也首先始于军事方面。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的“船坚炮利”论、魏源“以夷制夷”的呼声、洋务派的企业创办活动,都着重强调的是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南北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如决堤般洪水,汹涌而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面对这种情景,关心时事的郑观应逐渐感觉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主要

是“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材不攻兵阵”，^⑧即变中国为其“取材之地，牟利之场”。^⑨一方面，他通过细致分析西方列强对外侵略的历史后，指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⑩也就是说“商战”是目的，而“兵战”只是为“商战”服务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他又反观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御敌的经历，“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战事不遗余力”，却仍然落下个外族人“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⑪的结局。中外历史的强烈对比说明：“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于是建议清政府，必须改变其传统的观念与御侮方式，“以财战不以力战”。^⑫

2. 强调“以工翼商”，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

在郑观应的著述中，“商战”具有双重含义，一为“商业之战”，另为“商务之战”。前者为狭义，专指商品流通领域里的市场争夺；后者为广义，泛指国家间经济实力强弱的对比，直观体现在对外贸能力的大小上。这两层含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可从“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⑬等诸如此类的言论中表现出来。

作为攘外自强之策的“商战”，郑观应主要强调广义上的意义，即通过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来与列强展开竞争。他明确提出了“以商立国”的口号，并把发展商品经济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那么，如何才能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即“商务”）呢？郑观应提出了这样几条原则：第一，重视商业的疏导制约作用。他认识到：“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⑭以此为据，他提出了兴办铁路、通讯、航运、银行、统一税收货币等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重要措施。第二，特别强调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后盾作用。郑观应清楚地认识到：商务要发展，商战要操胜算，在税收等与洋商平等的条件下，自身拥有成本低廉的工业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他认为：“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⑮故“制造一事为通商、练兵之纲领”。^⑯随着列强在华工业投资的增多，他更加肯定了工业对国家富强的基础作用，从而体现出视工业为商务之本的鲜明观点。第三，使用先进机器技术是增强商务实力的最重要手段。郑观应指出，由于中国长期不重视讲求制造诸学，导致“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漏卮愈甚”。更由于“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⑰因此，他强调只有把大批新式机器运用于工、矿、农等部门中，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获得“商战”的胜利。

3. 官为商助，形成商战的良好社会条件

“商战”是不同国家或民族对商品市场的争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下的近代中国，主权不独立，中外经济交往突出表现为外国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活动。面对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郑观应非常重视政府对民族经济的保护与扶植作用。他指出：“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⑱并派领事与兵轮保护通商；而中国却因“士大夫积习太深，……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⑲以致形成商战中中国的失利，导致利权的外溢。

为保证与洋商在竞争中取胜，郑观应向中国当道者呼吁：“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强烈要求“商务之战，即应藉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⑳在官为商助这一

问题上,他向清政府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首先,应尽快设立专门负责管理、保护、推广商务事宜的行政机构。他要求中央设商部,行省设商务总局,各地设立分局;由熟识商务、体恤商民的人负责局务;商民可随时向当地商董或直接向商务大臣反映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只有这样,“则兴废当,谋划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②

其次,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几十年参与洋务企业活动的经历,使郑观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官办”企业的弊端:“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位卑而权轻者,相率而听命。公司得有盈馀,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历观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③有鉴于此,他遂大力倡导自由企业制度。一方面,要求办厂自由,“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④另外,他还主张企业的自主经营与管理,“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组成企业管理机构,“藉以探本业之隆替”,^⑤研究和决定公司的业务。

再次,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要促进民族近代工商事业的发展,增强“商战”的实力,郑观应还要求政府必须给予税收上的优待。针对中外商品在税负上的不公平,他提出了“裁撤厘金、倍增关税”^⑥的主张。同时,为了扶植民族工业的成长和推动商品出口,他进一步提出了“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关税保护政策。他还强调,要真正实现关税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必须要收回海关权,实行海关自主,如其所言:“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⑦

由上可见,郑观应的“商战”论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它是以商品经济为基、近代工业为根、商业贸易为枝、西方科技为养料的一株经济大树。他希望通过培植这样一棵大树,结出中国富强的果实来。

三、对“商战”论的认识与评价

通观前两节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郑观应“商战”思想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 始终贯穿着反抗外族侵略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的主线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日益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救亡图存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了近代中国爱国志士的座右铭。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方式已由军事侵略转向以商品倾销为主的经济渗透,导致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和利权的不断外溢。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要抵御外国侵略,就必须“先富而后强”,把重点放在反抗列强的经济侵略上。郑观应在“目击时艰”的情状下,树立了“先学商战于外人,继之于外人商战”的抱负,并逐步提出和完善了进行“商战”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完全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御侮自强的先决条件,冲破了洋务派“坚船利炮”中心论的局限。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处处可见。

2. 其中包含着许多发展中国商品经济的真知灼见

郑观应为了确保中国“商战”的胜利,其理论紧紧围绕着如何拥有价廉物美的商品这个核心进行探讨,从而得出了“工商互为表里”、“以工翼商”、“以商贾之道”办企业、放经营权于商民以及依靠科技和先进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发展商品经济的一系列结论。同时,他还能够结合当时中国实际,提出一些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商战”之方。

(下转第55页)

根据表 1 数据及公式(10)和(11),各城市的区位适宜度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全国 19 个大中城市的区位适宜度的高低及其排序情况,它与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

三、结束语

当前关于城市区位理论及方法的研究,是倍受重视的问题。本文综述了城市区位的基本理论及其主要空间分布模式,探讨了区位的内涵,及城市运行机制的功能,提出了城市区位适宜度这一新模式及其计算公式,对全国 19 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定量分析。该模式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具有实用价值。它对城市运行机制的宏观调控,对于城市区位的定量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①杨吾扬:《区位论原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②杨吾扬、梁进社:地域分工与区位优势。《地理学报》,1987 年 3 期。
③陆大道:《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8 年。
④安成谋:兰州市商业中心的区位格局与优势度分析,《地理研究》,1990,1。
⑤杨吾扬:论城市体系,《地理研究》,1987,3。
⑥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技出版社,1983,12。
⑦陈宗兴、唐海彬等:《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8。
⑧严重敏:试论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组织的演变,《世界地理集刊》,第 6 集,商务印书馆,1983。

~~~~~  
(上接第 46 页)

所有这些,都说明其“商战”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对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很有启发意义。  
3. 在性质上,“商战”论是蒙着重商主义薄纱的一个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纲领

郑观应开始理性思考中国社会问题、形成其经济理论的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点以商品输出的形式对中国加紧经济侵略的时代,中外经济差距最直观凸现在中国贸易入超上。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强调“坚船利炮”、发展军事工业的言行还很浓烈,再加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还多为商人。这些因素影响郑观应把自己的经济思想简括为“商战”主张,颇有点重商主义的色彩。然而,我们从前面有关内容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商战”论绝不是重商主义的理论。首先,它并非囿于商品的流通过程,而且还探讨了“以工翼商”、“工商互为表里”等生产过程的问题,即关心的是民族职能资本的整体运动。其次,郑观应提出“商战”主张的目的在于富强救国,防止利权的外流,而不是只顾商业资本家的利益。所以说,“商战”论只是蒙着一层重商主义的薄纱,在根本性质上却是一个全面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在当时及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内,它都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的思想范畴。

---

注释:  
①据杨端六、侯厚培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删编。  
③《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6,第 25 页。 ⑤陈忠经辑:《皇朝经世文三编》,1898 年出版,卷 61,第 7 页。  
⑧赵 靖、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第 109 页。  
②④⑦—⑮,均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版,页码分别是第 63 页、73 页、586 页、615 页、595 页、586 页、590 页、604 页、607 页、729 页、725 页、626—627 页、607 页、109 页、588—589 页、617 页、611 页、612 页、611—612 页、543 页、546 页。